

先秦儒家教材研究

——以《詩》、《書》為中心

張偉保 著

本書結合教育學、文獻學、歷史學等不同學科的綜合研究，是中國教育史的「教材史」領域的一項嶄新成果，對傳統語文教材和先秦儒學具有一定的參考作用。

全書分為總論和分論兩部分，前者通論先秦儒家教材的早期發展和作用為主，後者則對不同階段和不同主題作出深入論述，以說明以《詩》、《書》為中心的儒家教材的形成和發展的真實狀況。



史學研究叢書·歷史文化叢刊

先秦儒家教材研究

——以《詩》、《書》為中心

張偉保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先秦儒家教材研究：以《詩》、《書》為中心

/ 張偉保著. -- 初版. -- 臺北市：萬卷樓, 2013.12

面；公分. -- (史學研究叢書)

ISBN 978-957-739-833-8(平裝)

1. 詩經 2. 書經 3. 研究考訂

831.18

102023901

先秦儒家教材研究： 以《詩》、《書》為中心

2013 年 12 月 初版 平裝

ISBN 978-957-739-833-8

定價：新台幣 240 元

作者	張偉保	出版者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人	陳滿銘	編輯部地址	106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9 樓之 4
總編輯	陳滿銘	電話	02-23216565
副總編輯	張晏瑞	傳真	02-23218698
責任編輯	吳家嘉	電郵	editor@wanjuan.com.tw
編輯	游依玲	發行所地址	106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6 樓之 3
編輯助理	楊子葳	電話	02-23216565
封面設計	斐類設計	傳真	02-23944113
		印刷者	百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5655 號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

網路書店 www.wanjuan.com.tw

請寄回更換

劃撥帳號 15624015

目次

上編

總論：先秦儒家教材初探

一 前言	1
二 前六藝（官學獨尊）時期的教育	1
三 平民教育的開端：孔子及其時代	6
四 從前六藝到六經	9
五 孔門弟子出仕與士階層的興起	14
六 結語	17

下編

分論一 西周時代的官學教育	19
分論二 孔子與前六藝——《論語》摘錄	37
分論三 春秋時代的詩樂教育	51
分論四 孔子對《詩》的整理	59
分論五 孔門詩教的最終完成——《孔子詩論》	65
分論六 戰國以前《（尚）書》的流傳	81
分論七 原始儒家語文教材的形成——以《詩》、《書》為例	105
分論八 六經及相關文獻的編定	117
分論九 出土文獻與先秦儒家教材	141

附錄一：兩則儒家出土教材文獻	155
附錄二：孔子引《書》論《書》資料	163
後記	171

上編

總論：先秦儒家教材初探¹

一 前言

本章旨在探索先秦儒家教材的產生和演變的經過，期望能為中國教育史增添點基礎材料。有關材料部分存於流傳至今的典籍之中，亦有部分材料散佈於近世出土文獻中。前者較易搜集，而後者則極為零散，筆者往往限於見聞，未必能全面收集和整理。也有一些新近發表的材料，筆者當繼續收集，俾免缺漏。

漢武帝時，司馬遷說：「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又慨嘆「《詩》、《書》……缺」²，何況今天距離先秦之世，至少已逾二千二百年，要排比整理先秦儒家教材，其難度自然極大。然近世以來學術有不少進步，對古籍的整理有不少的突破；加上地不愛寶，先秦兩漢的甲骨、簡牘、帛書、彝器、玉石等記錄着古人行事的文字材料不斷出土³，提供十分寶貴的新材料。因此，對於先秦儒家教材的探究，或許是可行的，也可對有關課題稍作補充。

二 前六藝（官學獨尊）時期的教育

先秦教育可粗略劃分為兩個階段：一、官學獨尊時期；二、

¹ 拙文原題為〈先秦儒家教材試探〉，現略作調整，並稍加補訂。

²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72年），頁825。

³ 可參看拙著：〈出土文獻概說〉，《書海指南：中國古籍導讀》（臺南市：能仁出版社，2006年）。

私學盛行時期。兩個時期頗難截然劃分，今以「三十而立」的孔子，首先開創平民教育為分界，即約在公元前五百二十年前後為斷。⁴

在「官學獨尊」時期，只有貴族子弟才有受教育的機會。遠在五帝、夏商時代，官位大致屬於世襲的。因此，學在官府和以吏為師便屬常態。除貴族以外，只有個別聰穎子弟受到特別的照顧，才以從庶人身份受到提拔而有接受教育的機會。即使是貴族子弟，也並不一定有相當的學養才能繼承父輩的官職。因此，孔子曾指出春秋時代或以前的入仕條件，「先進於禮樂」的是一般的平民黎庶，「後進於禮樂」的則是有土有民的君子。⁵

夏、商之世，記載缺略，關於當時的官學，即所謂庠序之教。其時既屬世官時代，故主要的教育當在家族之中。如百工技藝，必自幼習之，逐漸掌握其中技巧。《學記》說：「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⁶然而，天子富有四海，故當別有學校以教育皇族和公卿大夫的子弟。其所學即禮樂射御書數等貴族社會必須懂得的學問，亦即所謂「前六藝」。此種情況，亦必延續至西周以至春秋的中晚期，即上文所謂官學獨尊時代。究「前六藝」能持續千百年而不衰，概由社會性質、生產技術均在一種緩慢的演變狀態發展，並未經歷鉅大的變革，故所需學問即

⁴ 孔子之前或有記載反映已有私人講學的活動，只是文獻欠缺確切證據，加上其對後世之影響實有限，故世人多認同孔子為平民講學的始創者。參看陳槃：《春秋列國的教育》，收於氏著：《舊學舊史說叢》（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93年），下冊，頁281-282。

⁵ 楊伯峻說「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是指「先有了官位而後學習禮樂的是卿大夫的子弟。」見楊伯峻：《論語譯注》（香港：中華書局，2010年），頁108。

⁶ 王夢鷗：《禮記今注今譯》（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年），下冊，頁486。

使有精粗巨細之別，卻沒有革命性的改變。《禮記·文王世子》曾就當時教學安排加以較為詳細的說明，指出：

凡學（教）世子及學（教）士，必時。⁷春夏學（教）干戈，秋冬學（教）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教）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教）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教）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教）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⁸

至於諸侯國的貴族子弟受教育的內容，可從春秋中葉的楚國對世子教育的設計而獲得一些概念。《國語·楚語上》的一段材料：楚莊王命士亹（音味）作太傅，士亹雖堅辭卻不受允許，於是去請教賢大夫申叔時。申叔時對士亹講到太子應習的科目如下：

⁷ 同前註，頁2760引《尚書 盤庚上》疏引此文曰：「『學』字……是古『教』字，下文同」，故此句即為「凡教世子及教士」，而下文所引「學」字皆是「教」字。

⁸ 同前註，頁276-277。按此段文字較複雜，也有倒誤的情況，請參看王氏此段注文。為清晰理解這段引文，現引王氏譯文作參考：「凡是教世子及教士子，必有區分時期。春夏二時，教以干戈武舞；秋冬二時，教以羽籥文舞，教學皆在東序。小樂正教授干戈之舞，由大胥協助；籥師教授羽籥之舞，由籥師丞協助，大樂正教授武舞，則由大胥掌鼓，節以南樂。春天背誦樂詩，夏天則以絃樂伴奏，都由大師指導。秋天在瞽宗學行禮，由司儀者提調之。冬天則在上庠讀書，由典書者指導。凡是學校舉行祭典及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由小樂正在東序中指導之。合語及乞言，則由大樂正授以進行的程序，並由大司成加以總評，亦在東序中舉行。」

- (1)《春秋》：其作用在獎善抑惡，「勸戒其心」。
- (2)《世》（貴族宗譜）：說明有德者世顯，昏亂者世廢，以為鑒戒。
- (3)《詩》：培養道德情感和意志。
- (4)《禮》：使知「上下之則」。
- (5)《樂》：除去邪念和浮躁情緒。
- (6)《令》：瞭解百官職責和施政原則。
- (7)《語》（貴族言論的記錄）：說明先王如何發揚德治，使民心歸附。
- (8)《故志》（舊史）：使知道國家的興廢，心存戒懼。
- (9)《訓典》（即《尚書》類典籍）：「先王之書」。⁹

通過這些材料，讓我們明瞭當時一般貴族學習的材料。這些教材，大部分是由「炎黃以來流傳下來作為樂典的歷代聖王樂舞，歷代君臣的典、誥、訓、謨、誓、令，以及西周的哲典、政典之類，徵集、整理以反映民俗、社況、政情、史蹟諸方面的詩章。」¹⁰申叔時在詳述世子教育內容後，再進一步說：

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

⁹ 參看張瑞璠主編：《中國教育史研究·先秦分卷》（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33。按：《訓典》的解釋為「使知族類親疏，以區別對待」，似不準確，故改用《左傳·文公六年》夏「秦伯任好卒」條，杜預注。張氏同時指出這九種科目的內容包括政治、倫理、歷史和文藝等方面，比傳統的「六藝」更為豐富。又按：其中，《世》即《世本》一類材料。《漢書·藝文志》云：「《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迄春秋時諸侯大夫。」；《語》也可能是《國語》一類文獻。王充《論衡·案書》云：「《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詞語尚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詞以實之。」

¹⁰ 董立章：《國語譯注辨析》（廣州市：暨南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625。

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導之忠，明久長以導之信，明度量以導之義，明等級以導之禮，明恭儉以導之孝，明敬戒以導之事，明慈愛以導之仁，明昭利以導之文，明除害以導之武，明精意以導之罰，明正德以導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

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¹¹

據董立章先生的研究，申叔時其實對士蠶的指導十分全面，是「我國、也是世界首次對教育理論的系統闡述。」¹²他更提示士蠶，如果經這種教育仍無法成材，最好是「就任師保不久便應辭職告退」，以免日後受到羞愧。¹³

到了春秋末年，經歷了「天子失官」、「禮崩樂壞」，諸侯兼併，大夫僭越的局面，社會形態發生急劇的變化。孔子適生於其時，既是「聖人之後」，又「好學不倦」，終於成為一代聖賢、萬世師表，成功開創平民教育的先河。

¹¹ 同前註，頁616-617。

¹² 同前註，頁626。

¹³ 同前註，頁612。

三 平民教育的開端：孔子及其時代

孔氏之先世為宋人，是殷商皇族的裔孫，其曾祖父孔防叔因「畏華氏之逼而奔魯。」¹⁴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即孔子也。¹⁵孔子少孤，母顏氏與之回到故鄉曲阜，生活較為艱苦。孔子自幼即好學，「為兒嬉戲，嘗陳俎豆，設禮容」，又自稱「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又說：「吾不試（用也），故藝。」¹⁶到了青年時，便「志於學」。關於孔子年輕時的經歷，文獻記載有限，如孔子以「好禮」見稱於世。年十七「母死……邾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又《史記索隱》引《家語》說：「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亓官氏，一歲而生伯魚。」¹⁷年二十八時，郯子來朝魯，昭子提及「少皞氏鳥命官，何故也？」郯子說：「昔者，黃帝氏以雲紀……炎帝氏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太皞氏以龍紀……我高祖少皞氏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孔子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¹⁸孔子早年地位不高，事蹟亦較罕見。而所保留的資料，多與學習有關。到了而立之年，遂開始從事教育工作。

首先，孔子何以選擇開辦學校、擔任教師作為自己的事業。這可從其家世與學養兩方面來加以探討。家世方面，孔子既早孤，未能繼父親叔梁紇為大夫，家道遂中落。然其先世有大德，

¹⁴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725。

¹⁵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725-726。按：藝是技藝、技能。

¹⁶ 楊伯峻：《論語譯注》，頁87、88。

¹⁷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747。

¹⁸ 《左傳·昭公十七年》，《十三經》（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1137-1138。

故被稱為「聖人之後……其祖弗父何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若必師之」¹⁹，故有一定的社會地位與聲望，較能吸引弟子從學。另一方面，春秋時，禮義仍為社會的基本價值準則，故孔子既身處文化蓬勃的齊魯文化圈，又以「學無常師」，秉持「入太廟，每事問」的好學不倦的精神，終於在三十歲時有所卓立，故遂開創平民講學的新局面。弟子之中，雖有孟懿子、南宮适（音括）一類貴族出身的，但更多的是出身草根、或身世由貴族降至平民的子弟，如顏淵、子路、樊遲等。所以，孔子說：「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²⁰，大概反映了孔門的實際情況。

其次，弟子何以又熱衷於私學？這大概是為了回應當時社會的需求。其時，周天子地位下降，五霸皆以武力為尚，對傳統貴族教育未予應有的重視，甚或加以打壓。例如，鄭國的鄉校因譏議朝政，遭鄭國當權者之嫉諱，遂欲毀之，幸獲子產之力，才得以倖存。²¹由此可知，春秋晚年官學的普遍衰敗，而貴族間多僭越之行為。²²因此，有一些貴族子弟希冀從學於孔子。至於平民子弟的求學原因，則有似於十九世紀初在中國沿海的狀況。其時接近澳門的香山縣民，往往為其子姪尋求學習英語的機會，以便

¹⁹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727。按：時，孔子年十七。

²⁰ 楊伯峻：《論語譯注》，頁66。此外，「束脩」一詞除可解釋為「肉脯」外，另有一說是「束髮」，即年約十五歲的青少年。按：杜維明教授認為後一說更合理。

²¹ 按：《史記》沒有為子產立傳。其生平事蹟可參看南宋理學家胡寅的〈子產傳〉，收於胡氏《斐然集》（長沙市：岳麓書社，2009年），卷24，頁454-472。

²² 按：以魯國為例，夫子曾提及「三家者以《雍》撤」（八佾）、「季氏旅於泰山」（八佾），均屬僭越的明顯事例。

在洋行謀一差事，以改善生活。春秋後期，社會變化加劇，統治者逐漸意識到招攬人才的重要，為基層平民子弟提供發展的機會。孔子一生正經歷此鉅大的社會變遷。他年少時曾為「委吏、乘田」等職，後強學不已，遂受到魯國執政的拔用，終在五十歲後，被任命為「中都宰……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²³審視孔子的經歷，正反映春秋晚年統治者對「士」的渴求²⁴。在這個時代風氣的牽動下，孔門弟子的數目便日益加增。在《論語》中，有三則記載反映孔子弟子求學的動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²⁵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²⁶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²⁷

²³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731。

²⁴ 參看余英時：〈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士與中國文化》（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一章，頁1-74。

²⁵ 楊伯峻：《論語譯注》，頁133。

²⁶ 同前註，頁19。

²⁷ 同前註，頁166。

三者對象或有不同，但仍足以反映當時基層子弟對追求改善經濟生活的迫切要求。而弟子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億（臆）則屢中」²⁸，使他能夠資助夫子的政治活動，也是較為著名的例子。《論語》中曾多次記錄孔子督促伯魚學習，時間當屬較早，其時伯魚應只是個十餘歲的年青人，而孔子則為三十多歲。因《論語》記夫子見伯魚趨庭而過，向其問「學詩乎？」、「學禮乎？」、「女為〈周南〉、〈召南〉矣乎？」等內容，均屬較為基礎的《詩》、《禮》方面的知識，這方面的材料已為人們所熟知。此外，《孔子家語》也記錄了以下一則文字，較能反映孔子對學習的態度：

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唯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飭，不飭無類。無類失親，失親不忠。不忠失禮，失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污池，水潦注焉，萑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²⁹

四 從前六藝到六經

關於孔門的教學內容，大概可分為前後兩階段，前一階段當始自夫子開創私學，所授內容以子弟出仕為目的，所學以書、數等基本文化知識為開端，進有學習禮樂和射御。

²⁸ 同前註，頁114。

²⁹ 王國軒、王秀梅譯注：《孔子家語》（北京市：中華書局，2010年），頁70-71。

由此可見，夫子在前期以訓練弟子出仕為主，其內容自與「前六藝」基本一致，主要是致力於「士」的訓練。據余英時先生的分析，所謂春秋時代的「士」，是指貴族社會所需的「武士」。書、數是基本文化知識，是幼少時期的科目。及至年十二、三，便開始學習禮樂。到了十五、六的青年時期，身體逐漸成長，便開始射御的學習。這個過程即《禮記·少儀》所說：「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³⁰而《禮記·內則》更清楚地說明兒童自幼至成年時學習的內容，是一段極為珍貴的材料：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褲，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³¹

由此而言，當時的教學安排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教學內容也因應兒童成長的歷程，與現代的教育理論有極接近的地方。而禮樂射御書數便是當時的基本教學內容。

到了孔子晚年返回魯國，孔子對「六經」分別再加以研習、編訂和整理。我們再回顧夫子一生的教學經過。早期的前六藝教育中，在弟子們學習禮儀的過程中，由於《詩》、《樂》同源的理

³⁰ 王夢鷗：《禮記今注今譯》，頁460。

³¹ 同前註，頁386；王夢鷗今注曰：「數，由一至十。方名，東南西北……數日，鄭玄云：朔望與六甲也……書計，六藝中六書九數之學」，反映孩童學習書數的一般情況。

由，故二者亦當為弟子所修習的課題。其後，孔門以出仕為方向的教育，自然對收錄古代重要政治文獻的《書》加以講授。到了孔子約五十歲時，對《易》學產生了特殊的興趣，即所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³²而在年六十八時，夫子自衛返魯，對《詩》、《樂》作最後的修訂。在七十歲以後，夫子自知道不行於時，遂有《春秋》的修訂，以寄託其政治的最終理想，可視為最後的轉折，亦即孔子以「六經」為教材的最後修訂。³³司馬談在遺命中指出「幽、厲之後，王道制，禮樂廢，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又說：「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正好說明孔子與「經」的密切關係。³⁴

又，「六經」一詞始見於《莊子·天運》，其文曰：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也，以奸³⁵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者]，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³⁶

³² 楊伯峻：《論語譯注》，頁70。

³³ 相關文獻可參看本書下編〈分論八〉：〈六經及相關文獻的編定〉。

³⁴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頁1336。

³⁵ 按：即游說。

³⁶ 〔晉〕郭象注、〔唐〕成玄英疏：《莊子注疏》（北京市：中華書局，2011

文中兩次提及「六經」，指出孔子以六經游說時君，終不獲用，故向老聃請教。老聃認為「六經」是先王應付其所處的時代問題的東西，而孔子欲將它們施之於當世，實為錯誤，故當世君主不予採用。由於《莊子》這部書包括了很多寓言，此段文字應屬子虛烏有，並不可信，但作為文獻材料，則說明在戰國晚期，「天運」篇的作者確實認為孔子與六經有密切的關係。雖然這段記載曾被視為孤證，受到學者的普遍質疑。大部分學者認為「六經」之說可能始自漢初。但是，最近出土的文獻：《郭店楚墓竹簡》有以下兩項記錄，反映在公元前三、四世紀已確實把它們放在一起，並就其性質加以評論：

1.《詩》，所以會古今之志也。《書》，……者也。《禮》，交之行序也。《樂》，或生或教者也。《易》，所以會天道人道也。《春秋》，所以會古今之事也。

2.故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職，而訕誇無由作也。觀諸《詩》、《書》，則亦在矣；觀諸《禮》、《樂》，則亦在矣。觀諸《易》、《春秋》，則亦在矣。親此多也，密此多也，美此多也。道無止。³⁷

由於這類出土文獻絕對未經後人竄改，故十分可靠。它與〈天運〉篇相似，同樣反映戰國後期已將「六經」視為一個整體。根據司馬遷的說法，孔子「以《詩》、《書》、《禮》、《樂》教」，「晚

年），頁288。

³⁷ 劉釗：〈語叢一〉，《郭店楚簡校釋》（福州市：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191。〈六德〉，頁115。按：所引均為劉氏的釋文。